

红旗飘飘

革命先烈故事特輯

5

紅旗飄飄

第5集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168 1/32 8 1/4 印張 206,000字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10009·309

定 价 七 角



第5集 1957年12月15日出版

目 次

編者的話	3
片斷的回憶（憶趙世炎）	夏之栩 5
憶太雷	王一知 13
皖北蘇維埃的創始人之一魏野疇	李力果 20
悼向警予同志	李立三 28
海陸豐農民運動的領導者彭湃	侯楓 32
紀念蔡和森同志	李立三 46
紅二十五軍軍長蔡昇熙	黃河清 51
僮族人民優秀的儿子韋拔群	謝扶民 54
吉鴻昌就義前后	吉胡洪霞 62
方志敏同志在樓底藍家村	羅寧 74
瞿秋白同志战斗的一生	溫濟澤 79
西北的一顆紅星（劉志丹故事片斷）	本刊輯 108
和楊靖宇同志三次會見	何成湘 119
楊靖宇將軍轉戰在白山黑水間	于連水 124
和左權同志相处的日子	楊得志 132
左權將軍在太行山上	郭樹保 138
陳潭秋同志二三事	張文秋 149
長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	王群 152

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楓同志	張震	156
毕生难忘(忆彭雪楓同志)	姜國華	163
王若飛同志故事片斷	本刊輯	172
追隨葉挺將軍兩年	熊輝	175
羅炳輝將軍生平	史芬	180
關向應同志故事片斷	本刊輯	225
抗戰初期的續范亭同志	南新宙	235
深深的懷念(憶朱瑞)	潘彩琴	252
在任弼時同志的身邊	毛少先	257
紅軍時代的楊立三同志	朱達	261

革命先烈傳

當我們着手編輯這本“革命先烈故事特輯”的時候，我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同志講的這樣一段話：“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难过，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迹前進吧！”（“論聯合政府”）

千百萬的革命戰士遵照着毛澤東同志的話前進，他們繼承了先烈的遺志，把革命事業推向勝利。我們的勝利是英雄人民奮鬥爭的結果，也是無數先烈的血的結晶。革命烈士的壯烈事迹和英雄行為，永遠是我們的光輝榜樣。他們的名字永遠照耀着我們，他們的英雄主義永遠激勵着我們。當我們前進的時候，想起他們，便會加快腳步；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想起他們，便會勇气百倍，增強了足以摧毀一切前進障礙的力量與信心。

多少年來，廣大青年讀者都把革命先烈當作自己的老師和朋友；他們把學習烈士的革命品質當作教育自己、改造自己的最重要的課程。在集會上，在陳列館里，在課堂上，在書店裏，凡是有关革命烈士的一張照片、一幅圖畫、一首詩，甚至一些零星的回憶和記述，都會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喚起他們無比的革命熱情。有關記述革命烈士斗争生活的出版物，在培养青年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的教育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根據青年讀者的迫切需要，長久以來，我們就希望多出版一些系統地、完整地描写革命烈士斗争故事的作品。可是，這類作品從調查研究、搜集材料到寫成，都需要較長的時間，往往不能及時地

滿足讀者的要求。為了回答讀者殷切的期望，我們先把這一部分有關烈士的回憶錄和編寫的烈士故事匯編出版。

這期文章的次序是按烈士犧牲的時間排列的。

在這個特輯里，有較為完整的烈士故事，如“瞿秋白同志戰鬥的一生”“羅炳輝將軍生平”；但更多的是有關烈士的回憶錄。在回憶錄里，有由烈士的親屬寫的，如回憶趙世炎、張太雷、吉鴻昌、朱瑞等篇；有由烈士的战友寫的，如回憶左权、彭雪楓、韋拔羣等篇；有由烈士的部下寫的，如回憶葉挺、楊靖宇、毛澤民等篇……這些回憶錄雖然不一定完整地記述了烈士的生平重要事迹，但確實記述了烈士事迹中的一些生動的片斷。這些珍貴的記述，使我們初步接觸了烈士們的心靈，烈士的高貴品質，它不但直接教育了我們，同時也給將來撰寫較完整的烈士傳記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待將來條件成熟時，我們希望能有完整而系統的烈士傳記獻給讀者。

除了這一集以外，本刊今后還打算繼續發表這方面的文章。我們殷切地希望：凡是熟悉革命先烈斗争事迹的同志（烈士的战友、部下和親屬等），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寫出來；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編輯、記者、宣傳教育工作者能通過採訪、調查，撰寫革命烈士的傳記和故事；各地的烈士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能供給我們有關烈士的材料和線索等。這是一件艱巨而繁重的工作，希望同志們能協助我們。

中國青年出版社“紅旗飄飄”編輯部

片 断 的 回 忆

——忆赵世炎

夏之柳

1

北京的“沙灘”这个街名，和聳立在沙灘街上的紅磚“沙灘大樓”^①，三十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虽然这条街的本身在解放以后已經在变化和发展着。現在，每当我走过沙灘的时候，我仍然要怀着默念的心情注視一下这紅磚的大樓，因为它常常喚起我对于当年一些革命先烈的回忆。

三十多年前，1924到1926年的沙灘一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和北方区党委指揮革命工作的中心活动地区之一。在“沙灘大樓”（当时是北京大学第一院，現在是学习杂志社）里，有我們党委的接头机关；有党的刊物——“政治生活”发行的房子；还有几个教室，是我們党、团支部夜間开会的場所。当然，这些活动，都是用各种方式秘密进行的。我們几乎每天可以在这里遇見当时党的市委書記赵世炎同志，和党委陈乔年，范鴻劼同志……等負責人。他們都住在沙灘附近，有的在北大宿舍，有的住公寓。世炎同志有家在西城，他为了工作方便，很少回去，因为夜晚是他最好的工作時間——上課，开会和写文章。

党委还有許多工作是不能完全在“沙灘大樓”处理的，所以虽然經濟条件很困难，也不能不另外租單院小平房，建立秘密机关。我們七、八个来北京不久的年青党员，开始就被派在这样的机关

^① 当时北京人都称这座紅房子为“沙灘大樓”。

里。我們表面上是学生，白天輪流出外工作，裝着上課的样子，晚上回來，合伙辦伙食。在機關里，世炎和喬年同志經常和我們在一起，因此，我們很幸运的能够直接受到他們的培养和教导。尤其是世炎同志，他的作风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他是我們学习上和工作中很好的老师。他講話很生动，在新党员的秘密訓練班里，我們都喜欢听他講課。他在工作的时候似乎不知道疲倦，写文章往往是通宵达旦，休息一下又馬上工作起来。对青年同志的教导很耐心、細致，我們有点进步就受到鼓励；如果有了錯誤，也受到严格的批評，而这种批評对我们是更大的帮助。同时，他又是我們亲密的朋友。他性格开朗，有說有笑，工作的时候很認真，休息的时候和大家一块玩得又很活潑，他可以和任何人都处得很好。

1952年底，我回到人民的北京来了，看見沙灘一帶都在逐渐变化和发展。今年九月，北京第一路无軌电車通车了，它橫貫北京东西，并穿沙灘而过。当我有时乘无軌电車路过沙灘，我为新中国的市政交通发展迅速而感到幸福，这时候，就更容易引起我对当年的回忆。我們的革命先烈們流尽了他們的鮮血，使我們今天才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在三十多年前，他們冒着暑热和风雪，同时也冒着生命的危險，日夜在沙灘一帶活动着。他們的足迹踏遍了沙灘周围的大街小巷。在冬季的深夜里，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冒着严寒快步前进。即使在这样的时候，行人已稀少，路灯又昏暗，还要机警地避免可能遇見的暗探釘梢，也要小心巡警的注意，以保証組織和个人的安全。

2

1925年“五卅”运动后，革命运动在北方各地都有发展，党中央决定成立以李大釗同志為書記的北方区党委，领导北方几省的革命工作，也兼北京市党的領導。世炎同志担任了区党委宣傳部的工作，并领导工人运动，因此他常去天津、唐山一帶活动，工作也更加繁忙了。1926年3月17日，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群众与軍警冲突，有人被刺刀戳伤。北京当时的軍閥政府

段祺瑞执政，企图用恐怖手段来吓退人民的反帝运动，反而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3月18日，一个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发动起来了。世炎同志是头一天（17日）从天津赶回来的，这天早晨，他去党委开会，我们宿舍的同志都去参加示威运动，许多党员和团员都担任着指挥、联络、发传单、贴标语等工作。大约快到中午时候，群众队伍来到了段祺瑞执政府（铁狮子胡同）门前，遭到了段祺瑞卫队的大屠杀，这就是“三一八”惨案。

我和几个同志好不容易冲出了铁狮子胡同，沿着东四大马路向南走，迎面跑来一位同志小声告诉我：“李大钊同志和党委的同志们都到铁狮子胡同去了！”我问：“世炎同志呢？”“也去了！”他回答说。我被他这几句话惊呆了，不知所措地靠墙站着。忽听有人大声呼喊：“两旁胡同里敌人有埋伏，要顺着大街走！”喊声惊醒了我，我一口气跑回机关，还没有人回来。我一心只想找党委的同志，转身又往医院跑，一连跑了几个医院，跑不动时就坐人力车。我心里想：“他们不能死！多少革命工作等待着他们去领导啊！最坏的估计是他们受了伤，躺在医院里了！”在医院里我看见了许多受伤的人，重伤者热血浸透了衣衫，惨不忍睹。医院里的惨景，只有更增加人民群众对当时统治阶级的仇恨！

这时，忽然有一个希望抓住了我：既然医院里没有发现他们，那一定回机关商量善后去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机关去，仍然是失望；我已经跑不动了，只好坐下来。有个人在床上躺着，我看不见是我在路上遇见的那位同志，正在因为无法找到李大钊同志在流泪。这时，我心里更为李大钊同志担忧。我想，世炎同志年青，机灵，有可能冲出来的，但是李大钊同志呢？我不敢再想下去！

乔年和世炎同志先后回来了，打破了房子里沉闷的空气。乔年同志胸口被刺刀戳伤，幸而未伤心臟，我们才放心了。

世炎同志是跳墙出来的，他说：“我们刚到铁狮子胡同不久就听见前面有枪声，队伍冲乱了，我被人群拥到墙根下，进退都不能，只好趁势爬上墙头翻出来，跳下去时头碰痛了，但没有受伤。”他又

說，“我已到過接頭機關，黨委其他同志已脫險；各支部初步檢查，黨團員死者六人，群眾約四十餘人，尚無確數，輕重傷者約二百以上。”

我們的緊張心情並未緩和，因為還沒有得到李大釗同志平安脫險的消息，同時我們又為死難者悲傷。直到天色將晚，才有同志來報告：“李大釗同志已脫險回家！”我們大家都舒了一口氣。

3

“三一八”慘案以後不久，世炎同志被派去參加“五一”節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指示：中國工人階級當前的任務是努力積聚力量，援助國民革命軍北伐，推翻軍閥的反動統治。會後，世炎同志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江浙區黨委的組織部長。當時，區黨委是兼任上海市黨的工作的，因此，世炎同志主要的工作也就是直接參加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準備武裝起義。同年八月，我也被調來上海工作了。

世炎同志到上海以後，即和區黨委書記羅亦農同志、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同志等為了完成第三次勞動大會的指示準備武裝起義而緊張工作着。世炎同志和總工會的同志們一道深入基層工會去活動，發動了各行各業連續三個月的大罷工，和在兩次起義前的總同盟罷工。世炎同志不僅是當時上海工人罷工運動的組織者；還寫了許多有關罷工的宣傳文章，登在党中央的刊物“向導”周刊上。他常用的筆名是“施英”，因此，這個名字當時曾為上海許多工人所熟悉，也為以後蔣介石反動派所忌恨。

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連續三次舉行武裝起義，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失敗了。但是，上海工人階級毫不因失敗而動搖，相反地，他們根據黨的指示積極地吸取了兩次起義的經驗教訓，準備工作更加充分，這就為第三次武裝起義打下了勝利的基礎。因此，上海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的組織——上海總工會發出準備第三次武裝起義的號召，回答是“時刻準備着行動”！

1927年3月，北伐軍在各地工农群众的大力援助下节节胜利，直向上海推进，在20日占领了龙华。区党委每天上午都要和上海市各区党的書記开碰头会（我因做秘書工作也參加）。在21日早晨八点多鐘，我照例到开会的地方去，路上遇見世炎同志，他說：“快点走！有好消息！”果然，在會議上亦农同志宣布：“北伐軍昨晚已抵龙华，上海工人今天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軍消灭軍閥桂、孫、唐的军队，夺取上海！上海总工会已經准备好命令，全市工人中午十二点总同盟罢工，下午一点开始軍事行动！”大家兴奋极了。散会时，世炎同志提醒我說：“你赶快回宿舍去一趟，通知娘娘^①，我們今晚都不能回去，战斗何时結束，何时回家，免得她老人家記挂！”

上海工人阶级采取了无比迅速的行动，提前一个鐘头就开始罢工了，并且在一个鐘头内完成了全市八十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組成了队伍到街道上去占领据点，女工也組成了許多救护队准备救护伤員，工人纠察队根据計劃立即开始了軍事行动。上海工人阶级这种迅速的行动，使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們大吃一惊！他們預感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偉大力量，对他们的統治將要发生不可抵御的威胁！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他們記憶犹新，这就埋伏下了“四一二”慘杀的种子。帝国主义者們惶惶不安，乃急于找寻他們的好奴才——蒋介石（当时的北伐軍总司令），勾結起来，鎮压上海工人阶级和殘害共产党员。

世炎同志和汪寿华同志都在閘北前綫指揮部指揮战斗。战斗开始后，工人纠察队以无比的英勇，用劣势的武装，在閘北天通庵及北火車站击退了敌人多次的冲锋，并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补充自己。激战了二十八小时，殘余的敌人，最后不得不在北火車站豎起了降旗。

記得在战斗开始那天的夜晚，閘北发生大火，我跟随亦农同志在离前綫不远的聯絡站里。从窗口外望，只見滿天紅光，我真为指

① 娘娘即革命的母亲夏娘娘。

揮部的同志耽心。亦农同志早已看到了，神情也很紧张，但因见我着急，反来安慰我说：“那里有群众，什么也不怕，大火是可以扑灭的！”我很想溜出去看看，刚走到胡同里，前线联络员来了，他阻止我出去，说前面有流弹伤人，他又向亦农同志报告指挥部未受危险，我们都安下心来。

战斗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小时，可是早已到达龙华的北伐军却按兵不动，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党委决定由总工会派人穿过火线去龙华，质问北伐军为何不配合进攻？在战斗结束后，我听回来的同志说，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前进，并与军阀毕庶澄的代表谈判，准备委任毕为军长，要毕交出上海，以免上海被工人夺去。

第二天下午五时左右，战斗结束了，我跟随亦农同志跑到闸北去看战绩，并且多么想看看指挥部的同志们啊！当然，战斗虽然结束了，还有更多的工作正在等着哩，他们一直忙到夜晚十点多钟，世炎同志才和我们同回宿舍来。娘娘准备了点心慰劳我们。饭后，接连十小时以上的紧张战斗后的疲劳，已迫使我们必须休息了。

4

上海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攻克了上海，消灭了军阀的部队以后，在龙华的北伐军才开进一个师来。但是，工人对他们仍然热烈欢迎，并且举行联欢会，对士兵进行政治宣传工作。蒋介石害怕了，在三个星期中接連换防两次，这就加重了工人纠察队维持治安的责任。上海工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博得了全市人民的称赞。

这个时候，蒋介石反动派正日夜忙于勾结帝国主义者制造纠纷来镇压工人，并把投降不久的军阀周凤岐的军队换防到上海来，以便于屠杀工人。4月11日夜半，蒋介石终于撕下了假面具，指挥武装流氓进攻总工会，制造借口来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首先诱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

世炎同志经常睡得很晚。12日拂晓，他听见枪声，就说不好，

一定出事了，立即起身坐待天明，赶到总工会去了。我不便太早出门，只能呆在家里着急，等到每天可以出外的时间，才到党委机关去打听消息。下午，上海工人群情激愤，包围了敌人司令部，要他们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因为这些武器是工人自己从敌人手里夺来武装自己的。号称革命的北伐军，依靠工农的援助取得了胜利，反过来缴工人的武装，这是工人阶级所不能容许的。但是，蒋介石已彻底叛变革命了，所以他们竟向工人群众开枪了，工人遭到了大屠杀，这就是“四一二”事变。

敌人疯狂地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进攻，工会和群众团体都遭封闭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英勇牺牲了！党委在亦农、世炎同志的领导下迅速转入地下活动，同志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活着的代替了死者的岗位，又继续战斗前进！

5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五月在武汉召开，亦农同志去武汉参加会议，世炎同志仍留在上海。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世炎同志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后，中央委派陈延年、王若飞两同志（都是中委）来到上海。为了便于领导工作，江浙区党委改组为江苏、浙江两个省委了，延年同志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世炎同志仍在省委担任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

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几乎每天都有警报，同志们不断地被捕或牺牲。六月下旬，新的江苏省委机关之一被敌人破坏了，延年同志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有郭伯和同志（省委组织部长）和韩步先（省委秘书长）。郭伯和同志英勇牺牲了，韩步先则无耻叛变了，他并且出卖了延年同志和世炎同志，来换取他自己的狗命。

7月2日下午，倾盆大雨，由于叛徒韩步先供出了世炎同志的住处，敌探冒雨来搜查，但世炎同志不在，敌探则坐待不走。虽然在敌探的监视下，娘娘仍机警地把窗口用作警号^①的花盆推下去，企

① 警号，当时秘密机关都用各种东西作记号，放在容易从外面看见的地方。

图摔碎在馬路上，以便引起世炎同志回来时或者有其他同志来时的注意，但未能发生作用。雨声很大，天色也很昏暗，很难发觉房子内外有什么变化，世炎同志终于回来了。敌探开门，让世炎同志进来。世炎同志踏进门槛，一切都清楚了。但他的神色很镇定。他走上楼去询问敌探为什么来搜查，并回答他们说自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但并不叫赵世炎这个名字。敌探翻箱倒柜搜查，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趁他们互相商量的时候，世炎同志悄悄地把若飞同志的地址告诉了我。因为是叛徒的告发，虽无证据，敌探也一定要将世炎同志带走。世炎同志从容起身，临下楼时回头望了我和娘娘一眼。从他的态度和眼神里，我了解他坚定的意志和献身的精神！

我找到了若飞同志，他听了这个消息很伤心。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但环境不允许有哭的自由，眼泪只能吞下肚去。若飞同志指示我到旅馆去暂时隐蔽起来，并告诉我如何进行营救的方法。但是，敌人找到了他们所痛恨的“施英”就是赵世炎（也是叛徒证实的）的时候，任何营救方法都是无用的了。

7月19日清晨，世炎同志终于被杀害了！在他牺牲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来纪念他的时候，他当年舍死忘生为它奋斗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已经八周年了。先烈们的遗志已经实现，他们的鲜血在祖国大地上已经开花结果，新中国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灿烂的前途！

忆 太 雷

王一知

太雷牺牲已經有三十年了，岁月虽長，也不能冲淡我对他的記憶和悼念，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是江苏常州人。在学生时代，他就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五四”前后，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时，积极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他倾向社会主义，参加了李大钊同志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原名張泰来，又名春木，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張太雷。这不仅因太雷与泰来同音，还有愿把自己化为大雷、震醒痴頑、打击强横的寓意。

他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就为革命牺牲了，但他确是个大雷。他从“五四”运动到广州起义这短短的几年中，所写的文章和所作的講演，都如怒雷般震动了人心，震撼了反动統治的基石。特別是他领导广州起义，在西瓜园誓师的时候，“他那宏亮的声音，激动了每一个到会的人，千万人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①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变——广州公社的火花，就是这样熊熊地燒起来了。兩点鐘就赤化了广州城！“真是一声霹靂惊破了敌人胆！”

太雷在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就被敌人的枪彈击中，壯烈牺牲了。他是广州起义政治上、組織上主要的領導者之一，同时还是这次起义軍事上的指揮者。他的名字將永远同广州公社这一光輝革命历史密切联系着，他是永垂不朽的。

我認識太雷是在 1922 年。那时我在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平民女校是我党所办，設有工讀互助班，專收年長失学或中等学校毕

^① 見參加广州起义的老战士施展談“广州公社的火花”，該文載于1957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业后有志升学而限于經濟条件不得入大学的女生。校务由李达同志主持，实为我党活动机关，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在那儿来往。陈望道、沈雁冰給我們上过課，刘少奇同志給我們作过报告。刘少奇同志那时剛从苏联回国，同學們最喜欢听他談苏联情况。那时，我們是多么向往社会主义苏联呵！当时从苏联回来的人还不多。听说太雷在1921年曾到过苏联，参加过第三国际代表大会，我們也很想听他談談。可是，他另有任务，很少到我們学校里来。后来才知道他那时正为我党同国民党合作的問題在奔走。他在这年为国共合作問題曾到过广州。

虽然这时我同太雷很少接触，可是有一件事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得在1922年下半年，我們在平民女校的几个湖南四川籍的同学剛搬家，因一时无錢租不起木器，房間里空落落的一件家具也沒有。忽然，有一天，大家从外边回来，看見地下放着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套旧西裝，里面有一張字条，上面写着：“你們把它拿去当了罢！”下面沒有署名，不知是誰留下的。可是大家很快就想到：这可能是張太雷的。因为那套西裝的尺寸相当長大，只有象太雷这样个子高大的人才合适；而且当时在我們接触的人中，太雷是常穿西裝的，其他的人則很少穿。太雷为什么常穿西裝呢？因为他去年为了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會議，在旧貨鋪买了兩套西裝。后来一問，果然是他的。当时大家都很穷，同志之間这样的推衣解縫是常有的事。

1923年下半年，上海大学开办了，我与几个湖南、四川籍同学轉到上海大学学习，“上大”也是我党所办，校長虽然是于右任（国民党員），不过是挂名而已，校务实际上由邓中夏、瞿秋白等同志主持。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太雷也在“上大”作教員，秋白同志剛从苏联回来，他又健談，我們一些同学就常到秋白的住所去向他請教，談問題。在这里常常遇見太雷。后来才知道太雷同秋白不仅因为是同乡同学（他俩以前都是江苏第五中学学生）才比較亲近，主要是他們俩对国共合作統一战綫政策有一致的認識，对其它問題也常有共同看法的原故。他俩都是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出

的中央委員。聽說太雷在第三次党代大会上是主張國共合作最有力的一個，也是反對張國燾的关门主義最有力的一個。我們在秋白那裏常常由蘇聯革命經驗談到中國革命問題——革命階段、性質和革命同盟軍問題；勞工問題和婦女問題等。他倆給我們不少的指教和解釋。我覺得秋白是溫文爾雅，象一個學問淵博的學者，談起問題來條理清晰，精辟透徹。而太雷呢，他的語言中沒有華麗的辭藻，他總是在我們談論得非常熱烈或是有爭論、有疑難的時候插進几句話，而他那簡單的几句話，總是能深入到問題的本質，有不可爭辯的邏輯力量，常使我們疑難解決，爭論停止。他还喜欢开玩笑，有他在場，总是談笑風生，歡騰四座。

這時我对他虽有一些了解，但还不深刻，也不知道他的工作情況。到1924年他擔任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以後，我們的接觸就更多些。因為那時我也在團中央婦委工作了一個短時期。在這一段日子里，我了解到他有非常的才能，作事寫文章好象毫不費力；他又無窮的精力，日夜的工作（他那時在上海民國日報任主筆，深夜才下班），總是精神奕奕，毫無倦色。

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使革命加快了步伐。1925年黨派太雷去廣州，作廣州國民政府蘇聯顧問鮑羅庭的助手。從這時起一直到1927年國民政府到了武漢，他都與鮑羅庭同志在一起，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日夕同國民黨的領袖們相周旋，致力於統一戰線工作。

這一年，我也到了廣州，同太雷生活在一起了。在這一段日子里，我得到他許多幫助和鼓勵，我也更進一步的了解了他。

我們住在鮑羅庭顧問的公館里。鮑顧問的辦公室設在樓上，鮑夫人同他們的兩個兒子也住在樓上。我們則住在樓下。樓下還有一個翻譯室，有幾個翻譯專譯當日各地報紙有關軍政的重要消息，供鮑顧問參考。這個翻譯室也歸太雷領導。太雷的工作比以前更繁忙了。每日都有川流不息的國民黨軍政首腦來與鮑羅庭會談，每周這些軍政首腦還要到鮑處來開幾次會議，這都需要太雷翻譯。鮑出去講演，當然也是他同去。總之鮑有所活動是离不开太